

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

荣维木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有关卢沟桥事变研究的著述，相继出版多种。其中专著有：《卢沟桥事变前后》（沈继英、柳成昌著，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马仲廉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七七事变》，（胡德坤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卢沟桥事变风云篇》（武月星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宋哲元与七七抗战》（李云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卢沟桥事变》（李云汉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卢沟桥事件》（江口圭一著，日本岩波书店1988年版）等。出版的史料有：《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党史资料室编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卢沟桥事变史料》上下册（载《革命文献》第106、107辑，台北1986年版）。此外，中外学者在中日战争史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著作中，对卢沟桥事变也都有记述与研究；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如王冷斋、秦德纯、刘汝明等人，先后撰写出版过回忆录，另有专题论文发表多篇。现将卢沟桥事变研究中存有争议的主要的学术观点介绍如下。

一 卢沟桥事变的起因

卢沟桥事变缘何而起？它的发生是否偶然？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两国史学界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国学者认为：卢沟桥事变如同九一八事变，完全是日本阴谋策划的产物，它的发生绝非偶然。日本学者中，固然有人仍在回避中日战争的性质问题，

极力否认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但能够客观看待历史的学者，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必然性予以充分肯定。井上清认为，“虽然日中战争全面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卢沟桥事件，但从宏观上讲，则是近代日中关系的整个历史发展所导致的结果”^①；藤原彰也提出：“不能说这次战争是偶然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一向企图扼杀中国革命并把中国全部领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②但是，即便是这些治学态度严肃的学者，他们在承认日本侵华战争必然性的同时，却都否认作为这场战争开端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法西斯的预谋。藤原彰认为：“造成战争契机的卢沟桥事件是偶发事件”，“这个事件和引起九一八事变的柳条沟(湖)事件不同，它并不是通过阴谋策划发动的事件。这时日军还没有对中国发动正式战争的计划”。^③井上清也说：“这个事件是否是日军蓄意炮制的‘第二次柳条沟(湖)事件’，很值得怀疑。”^④日本学者关于卢沟桥事变“偶发论”的主要论点是：

(一) 中国人在事变中放了“第一枪”，日军演习士兵失踪，从而引发了事变。在“第一枪”问题上又有两种说法：1. 认为是中国军队首先开枪射击。日本学者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藤原彰的《日本近现代史》、山冈贞次郎的《中国事变——它被隐秘的史实》等书均持此说，美国学者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也有相同看法。2. 认为是共产党首先开枪或鸣放鞭炮。日本学者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和美国学者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等书都是这种看法。

(二) 日本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正在“加强对苏战备”，

① 井上清：《日本近代史上的日中战争》，转见《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390页。

② 藤原彰：《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页。

③ 同上。

④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4页。

“无暇他顾”^①，因此不可能主动发动卢沟桥事变。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的战略重点仍放在对苏作战方面，最精锐的师团仍用于对苏备战，专司对苏作战的关东军兵力依然不断增强。^②

(三)至今尚未发现象柳条湖事件那样表明日军在事变前确有准备的内幕材料，来证明卢沟桥事变是阴谋制造的。当时日本“完全没有进行日华全面战争的计划和准备”^③，卢沟桥事变“是在没有料到的时机和场所突如其来地点燃的”^④。有的日本学者承认，在华日军“很多人想通过第二次满洲事变，建立‘功勋’”^⑤，但他们又把在华日军、军部和政府作出区别，认为日本政府在卢沟桥事变之初倾向于“不扩大”方针，意在表明事变并非出自政府决策。

中国学者对以上论点作了全面批驳。他们的主要论点是：

(一)纠缠“第一枪”问题没有意义，卢沟桥事变是在中国发生的，所谓“不法射击”这个概念，只能用来检查侵略者的行动。失去这个前提，就如同强盗入室反而纠缠主人是否打过强盗一样没有道理。但为澄清史实，中国学者仍然提出证据说明“第一枪”并非中国人所放。1.日本著作关于“第一枪”的说法，有“一发子弹”、“数发实弹”、“十几响”等等不同，还有先士兵失踪后响枪和先响枪后士兵失踪的不同，互相矛盾，显有不实。2.日军演习地点没有中国军队，事后查中国军队“每人所带子弹不少一枚”。3.关于日本对共产党的栽赃，台湾学者吴相湘曾当面向今井武夫提出，后者所示齐燮元手书第三条关于事变“胚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及其它排日系各团体之指导”，“丝毫不证明所谓放第一枪是共党分子”，“把蓝衣社和共产党两个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页。

② 转引赵延庆著《评卢沟桥事变“偶发论”的几个论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236页。

③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一)，第14页。

④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⑤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绝不相容的名词相提并论，更足证明观念含义极不肯定”。①
4.“第一枪”和“士兵失踪”两者并无必然联系，完全是日军为发动侵略而寻找借口。日军先以“士兵失踪”为进攻理由，但很快查明“失踪士兵”是因解手而离队，20分钟后即归，这才又把“第一枪”作为发动进攻的理由。5.有材料证明“第一枪”是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所为。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透露，茂川曾于7月8日承认7日指使“学生”放枪。后者在1946年6月24日接受法庭侦查时也供认“第一枪”是日本放的。1953年，日本学者秦郁彦询问茂川，后者虽否认指使放“第一枪”，却承认七七事变后他曾多次派人在中日两军间打冷枪放鞭炮②，不管怎样说法，所谓“第一枪”的根源是在日方。

(二)驳斥了日本的“无计划论”，指出卢沟桥事变完全是中国对早已确定的侵华计划的主动实施。论据主要是：1.虽然日本的对外战略存在“北进”和“南进”两种不同的扩张指向，并把苏联作为头号假想敌国，但根据实际力量对比，日本早在1936年的“帝国外交方针”中规定，“严戒由我方向苏联挑起事端”，尽管后来关东军几次与苏联发生冲突，却仅止于试探性攻击，因此，所谓重点对苏，并不意味首先进攻苏联，更多的是防范苏联在日本侵华时从背后夹击。从扩张顺序上看，“对华一击论”更具代表性，即在发动对苏战争前，“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威胁”。③所以，由于“对苏战备”而“无暇他顾”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2.日本1935年后的每个年度的作战计划中，都有侵华的内容，其中使用兵力、占领要地等，均有具体的规定，而平津地区则是必夺目标。因此，发动卢沟桥事变与日本事前的侵华整体战略是一致的。3.卢沟桥事变前日军是否有一个具

① 吴相湘：《卢沟桥第一枪》，《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再版，第27—29页。

② 陈在俊：《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的真相与背景》，见台北《革命文献》第107辑，第242—263页。

③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8页。

体细密的计划，并不是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先决条件，在侵华整体战略计划不变的情况下，更具体的作战计划可以在年度用兵设想的基础上临时制定。事实上，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时，也是在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才有了调兵和筹措军费等具体安排。这正如日本人自己所说，日军“总是沿用着这样的手法：先制造出一种‘事态’，然后再把它加以扩大”^①。4.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虽然出现“不扩大”派，但不能以此证明日本在事变前没有全面侵华战争计划。后来的事实说明，无论是内阁或是军部，也无论是陆军或是海军，“谁的意见和方案得到接受和实施，就成为正式的国家计划”。^②

(三) 驳斥了日本的“非阴谋论”，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军有预谋的行动，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借此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论据是：1. 日人的自白。今井武夫回忆，在事变前一个月，“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就已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③；1937年6月30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派驻北平人员对人说过，“一星期以内，如果不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就把我的脑袋给您”^④；7月1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回答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社社长松本重治，说后者关于近期将出事的担心是对的，并称：“二十九军方面是不会挑衅的，学生们的骚动也不过如此，闹不起大乱子来，实际上不如说日本方面多少有些问题……甚至有人说‘7月7日将发生一个事件’。”^⑤把卢沟桥事变同以上情况联系起来看，连今井武夫也说，“不能不使人怀疑是阴谋”^⑥。2. 日军在事变前有种种阴谋活动。1937年5—6月，

① 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第393页。

② 曲家源：《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山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④⑤ 转引赵延庆著《评卢沟桥事变“偶发论”的几个论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241页。

⑥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13页。

日本政府、军部、参谋本部等纷纷派员到华北考察和搜集情报，其中有人还侦查了卢沟桥的地形。到事变发生前，日军已绘制了相当精确的地图，甚至连道路走向、水井、人员、物资等细节都十分清楚。现地日军的演习不仅频繁，且明确把宛平城作为攻击目标。3.事变当夜1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接到报告，3时竟已制定好对事变的《宣传计划》。该计划共四项八款数十条，对事变每一细节的处理，都有具体的设想，这就使人难以相信它是在事变后仅两小时内写成的。

此外，中国学者间对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企图和事变中日本“不扩大”方针的实质，也有分歧观点。一般认为，卢沟桥事变意味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谓“不扩大”方针，主要是日本想拖延时间，以待援兵。但有人认为，如果日本发动事变是为立即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理应在事变前调兵遣将，否则，“在远离本土、附近无重兵的情况下，要打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其结果是难以想象的”^①；至于日本的“不扩大”方针，一方面是想攫取平津作根据地，俾其主力置于长城一带，来对付另一强敌苏联，一方面对于中国，想运用不战而屈的政策，故唱出所谓“平津局部化”及所谓“地方事件”，以因袭占我东北、侵我冀东察北的故伎。^②还有人认为，直到8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才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在此之前，无论卢沟桥事变“是‘偶然事件’，还是出于‘蓄意制造’，对日本来说，都没有以此作为借口，在华北或整个中国重新转入大规模军事进攻的目的”。^③

二 事变中蒋介石和宋哲元的对日态度

大陆著述中对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宋哲元华

^{①②} 龚和平：《卢沟桥抗战对日本北进苏联战略的牵制》，《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③ 王维礼、高二音：《论抗日战争的开端》，《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北地方政府的对日态度，评价不同。

(一) 关于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时的对日政策。

台湾学者一致认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决心抗战，一面督促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抵抗敌人的进攻，一面向全国作政治动员和军事部署。大陆学者则先后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过去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仍然坚持对日妥协的方针。持此观点者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时时幻想把卢沟桥事变当作地方性事件来解决，要冀察当局与日寇谈判，并以双方同时撤兵为条件，准备对日妥协”^①，对于宋哲元赴保定指挥，也被认作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逃往保定”。后来蒋介石迫于中国人民的压力，不敢作出对日投降的决策，但却把“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奉为国策^②，意指蒋政策仍立足于对日妥协。至日军进攻上海，使蒋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时，蒋才“不得不采取比较积极的抗日行动”^③，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蒋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和平”谈判。

一种观点认为，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一面指示华北当局宋哲元等与日军谈判，谋作地方事件解决；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准备抗战”^④，采取了“谈判”与“备战”并重的双重方针。持此观点者认为：在蒋介石“和与战”的抉择过程中，“应战不求战”、“不挑战必抗战”的提法，体现了蒋在这个时期的双重方针。一方面，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变的解决，仍抱有很大的“和平愿望”，以“不求战”、“不挑战”来保留对日谈判的回旋余地，事实上，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确曾努力与日本直接达成“和解”，或说服国际力量压迫日本放弃侵略；一方面，与

^① 龚古今等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②③} 同上，第76页；79页。

^④ 杨圣清、何仲山：《试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时不同，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提出了“应战”和“必抗战”，这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有抗日的打算。在实际行动中，蒋也切实积极进行抗战的准备，一面督促宋哲元“固守勿退”，一面调兵北上支援二十九军。持“双重方针”观点者，一般又认为，在双重方针下，蒋比较侧重“备战”一面。但对蒋何时彻底转向坚决抵抗的态度，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蒋介石7月13日提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决心运用全力抗战”，表明他已放弃了双重方针；有人认为，蒋7月17日的庐山谈话是他态度转变的标志；有人认为，蒋的庐山谈话仍留有妥协余地，直到8月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蒋介石和国民党才彻底实行坚决抗日的方针。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立即下了抗日决心并在具体组织领导抗战。^①持此观点者认为：7月8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就已表明了他的抗日决心。其后，蒋致二十九军的数次电报，基本内容是督导宋等人“从速切实加紧备战”，“勿受敌欺”。至于蒋同意宋等与日军的既定协议，也是替宋兜揽责任，以防日军离间，使宋能听命中央，速赴保定指挥抗敌。7月9日，蒋电促军政部长何应钦速回南京筹划抗敌军事，同时派兵北上援宋，“并对全国抗战及时作出了各种安排”，这些都说明蒋介石已开始组织领导抗战。^②在政治宣传方面，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与国民党高级党政军人员，纷纷发表谈话、演说、通电，谴责日本侵略，表明抗日决心，其中蒋的庐山谈话，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动员令”。^③在外交方面，有人不同意蒋希望对日直接交涉或通过国

^① 吕梁、王树荫：《抗日战争史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概述》，《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1期。

^② 曾景忠：《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第50页。

^③ 肖甡：《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及对策》，引书同上，第211页；215页。

际调解而作和平妥协的说法，认为蒋对日采取了攻势外交，对美英等国则是寻求它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因此，这些外交活动“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配合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①

（二）关于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时的对日态度。

多数学者，均因宋长城抗战有功而公认其为抗日将军，但对宋在卢沟桥事变中的所作所为，都持批评态度，认为其热衷“和平”谈判而疏于军事准备，幻想以局部妥協謀求苟安，一再错过有利战机，最终造成失败结局。如果说对宋评价有所不同，那就是对宋种种消极举措的原因，分析角度和结论尚有差距，对宋何时打消和平念头而决心抵抗，也略有区别。

宋哲元对日消极态度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有3点：一是宋对蒋心存疑虑，疑蒋非真心抗日，且“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二是宋错以为卢沟桥事变乃中日局部冲突，被日本的“不扩大”烟幕迷惑，产生“和平”幻想；三是二十九军内部有战“和”两派分歧，宋受到主和派的影响。关于蒋宋关系对宋处理事变态度的影响，也有人认为，蒋宋虽有矛盾，但宋与日谈判，“南京政府方面的游移态度及其模棱两可的指示，对宋起着主要作用”②；有人干脆认为，宋是根据蒋的“意旨”与日谈判③。台湾学者一般认为，宋哲元对日谈判谋求局部“和平”是违背蒋介石中央政府意愿的。不少大陆学者也越来越注意到，蒋宋之间在战“和”问题上有明显区别，前者的抗战态度确比后者积极，“政府恐怕宋哲元在日军的压迫下对日妥协……采取了大力支持宋对日抵抗的态度”。④关于宋哲元受二十九军内部主和派的影响，人们一般没有不同意见，但对主和派某些具体人物与宋

① 肖甡：《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及对策》，前引书，第211页，215页。

② 吕伟俊：《宋哲元》，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

③ 王树芹：《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谈判述评》，《山东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

④ 马仲廉：《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哲元在对日妥协问题上谁受到对方的影响更多，却有不同看法。多数人把张自忠看成是主和派的代表，其中有人认为，卢沟桥事变一开始，张就提出打起来只有共产党和国民党高兴，希望向日本妥协以求二十九军的自保；甚至有人认为，张留北平而宋赴保定，是张暗示宋不走将有碍与日谈判，宋被逼才做出这样的决定。^①也有人的认识恰好相反，说“张自忠在很大程度上是奉命行事，却又代人受过，有口难辩”^②，意为张不仅没有对宋产生影响，反而听命宋作了违心的事。还有人认为，宋留张与日军周旋，有“幻想求得日军停止进攻，以维持冀察原来局面”的动机。^③

宋哲元何时放弃“和平”幻想而决心抵抗？一般认为宋的转变有个渐进的过程，到7月27日晚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宋的对日态度彻底转变了。也有人认为，7月21日，宋哲元已领悟到“战争之事，将来恐不能免”，开始进行反击日军的军事部署，与部下商议8月1日出击。关于26日发生的广安门事件，台湾学者李云汉认为，是二十九军主动打的，“宋哲元曾表示下令抵抗日本”。^④

三、卢沟桥事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卢沟桥事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是，对卢沟桥事变是否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学者们认识并不一致。持否定态度的分别有“九一八”说、“一二九”说和“八一三”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九一八”说。

持“九一八”说者认为，卢沟桥事变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已经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他们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抗日战争的开端，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一是中国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形成。卢沟桥事

① 此为张克侠的回忆，见《北京地区抗战史料》，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② 沈继英、柳成昌：《卢沟桥事变前后》，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③ 马仲廉：《试论平津之战》，《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第233页。

④ 见《革命文献》，第107辑，台北1986年版，第262页。

变符合后一含义，但不符合前一含义。如果认为中日战争的开端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所宣传的九一八事变是局部或地方事件。^①

(二)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主题来看，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已成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②

(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已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卢沟桥事变前虽然没有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也从未停止。因此，卢沟桥事变不是标志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而是标志中国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规模。据此，可以把中国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局部抗战时期”；“卢沟桥事变爆发—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止的全国性抗战时期”。^③

此外，持上述观点者还有人引用日本学者关于“十五年战争”的说法。在日本学者中，鹤见俊辅、藤原彰、江口圭一、木坂顺一郎、池田诚等人，均持“十五年战争观”，即把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统称为“十五年战争”。

与上述观点相反，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他们的理由是：

(一)应当区分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3个不同的概念范畴。近代以来日本发动过两次大的侵华战争，第一次是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可称作第二次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学者的“十五年战争观”，应是从这个角度提出的。而抗日战争，却应从整个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开战算起。

①② 王维礼、高二音：《论抗日战争的开端》。

③ 刘庭华：《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阶段划分问题》，《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3期。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实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后来虽有抗日战事，但多半是局部的、自发的、不连续的，当时中国的总体形势是受日本宰割而未进行全民族的反抗，因此“怎么可以把屈辱的‘九一八’当作神圣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呢”？^①是卢沟桥事变掀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篇章，抗日战争也便由此开端。至于抗日战争时期，既以抗日战争为时期限定，它的开始时间应和抗日战争开端相一致。

（二）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有一个转化过程。从理论上讲，“九一八事变只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使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发生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②；从实际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蒋介石并没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共产党也不能不以反抗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保卫革命根据地为主要活动；中间阶级和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虽然不断高涨，但这些运动的直接目标还是对着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如果说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关键，那么卢沟桥事变则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支配地位。由此，各对立阶级捐弃前嫌，携手共同抵御外侮，中国近代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

（三）卢沟桥事变不仅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端，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与九一八事变不同，一方面，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并未长期停留在局部占领阶段，而是迅速扩大战争规模，对中国的蚕食政策已为鲸吞政策所代替；一方面，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反抗，也不再是局部的、自发的和不连续的，而是全局的、有组织的和长期不断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全民族抗战的号召，并很快命令红军开赴抗日前线；蒋介

^① 曾景忠：《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第41页。

^② 见《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开端问题综述》，《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6期。

石也很快“决心运用全力抗战”，他的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各民主党派、各派地方将领、各阶级阶层爱国人士，纷纷发表通电宣言，一致拥护抗日，并积极投入到实际抗日斗争。中国全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正式揭幕。^①

除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之外，有人主张，“作为专史，作为战争史的抗日战争史或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的着眼点是抗日战争或抗日斗争，从这里着眼，抗日战争可以从‘九一八’开始”，“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特定时期的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通史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史……应从七七事变算起”。^②还有人主张，应把卢沟桥事变看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因为它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③但是有人说，是九一八事变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④

关于卢沟桥事变研究，除以上几个方面的各种不同观点之外，对事变的史实细节，学者们也还有着不同的记述。比如，对于卢沟桥事变发动时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兵力人数问题，就有几种说法，少者几千，多者几万，相差十分悬殊，孰是孰非，亟待弄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见《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开端问题综述》，《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6期。

② 王桧林：《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三个问题》，《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③ 河流：《试论卢沟桥抗战的历史意义》，《党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④ 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